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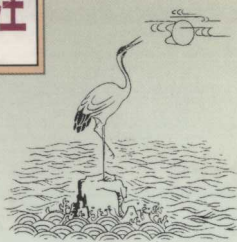
主编：王运熙 选注：马德富

苏辙卷

中国工人出版社

新选新注

唐宋八大家书系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苏 辙 卷

马德富 选注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苏辙卷/马德富选注.-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5

ISBN 7-5008-1893-9

I. 新… II. 马…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唐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宋代 IV. I 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595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兴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625
印 数	1~5060 册
定 价	14.00 元

总 序

王运熙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历史上，唐宋散文，特别是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八大家散文，无可辩驳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承秦汉古文的朴素自然而济以条畅，弃六朝骈体之繁缛雕琢而有所酌取，形成一种很适合于表情达意的新文体，这种文体长期为后世所颂扬，并被视为散文创作的典范。

最先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人合在一起，并予以大力推崇的是明初人朱右。他以八人文备三才之道，适万汇之宜，彰善制恶，褒是去非，可以为后世法式，故汇编其作，成《八先生文集》。嘉靖、隆庆年间，唐顺之竭力推崇唐宋散文，选先秦至宋文章为《文编》，于这一时期也标举韩柳欧苏等八家，并用以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秦汉古文派抗衡。稍后有茅坤服膺唐氏之论，遂专取韩柳等人文编成一集，径题为《唐宋八大家文钞》。由于唐顺之等唐宋派的提倡，《文钞》选录也较得当，其评语足为初学门径，流传颇广，“八大家”或“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此广泛传扬，他们的文章也因此家弦户诵，成为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

中国的散文，在先秦西汉时期，语言一般朴素自然。至东汉，

崇尚骈偶的骈文抬头。此后魏晋南北朝隋代，骈文日趋发展昌盛，除重骈偶外，还讲求辞藻、声律、用典等语言美。在这段时期内，骈文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此间骈文也产生过不少长于抒情写景、语言美丽的佳作，但因过分重视形式，束缚过大，影响了散文抒情达意的功能。当时虽有少数人起来批评和反对骈文，但均未奏效。至唐代，社会上流行的文体仍为骈文。唐代前中期，出现了若干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散文家，如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元结等，但因才力不足，认识上也有偏差，因而成就均不很突出。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才从根本上动摇了骈文的统治地位。

韩愈少从伯兄韩会游，为梁肃及萧颖士子荐所赏识，与李华从子李观结为至友。前辈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无疑对他产生过影响。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文学实践中，他用很大力气来提倡古文。基于正在走向上升的庶族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热情、社会理想和政治视野，他明确提出修辞明道的主张，认为作文正需师古，词必己出。词不管难易，唯求其是。文章必须是内在志气充沛的表现，所谓气盛而言宜。与此相联系，他还认为大凡不得其平而鸣的作品，尤有真实情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提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由于他行文能自树立，不但立意深刻，议论精到，且能兼采先秦汉代各家之长，自铸新词，风格浑灏宏肆而不失多样化，因而在散文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就。韩愈广事交游和招收弟子，传授古文，当时跟从他写作古文的士子颇多，古文创作在当时形成一种相当大的潮流。

在此期间，柳宗元的功绩也十分巨大。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基于进步的哲学

观、社会观，他还提出辅时及物为道之说。他重视作家的修养，重视认真揣摩和学习古人文章，于儒家经书和西汉古文外，兼取诸子散文和《楚辞》，如此“有乎内而饰乎外”（《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临文以敬，旁推交通，使他的散文别具一种隽永的魅力。如果说韩文气势宏肆，不可控驭，他则峻洁幽深，滋味醇厚。又由于他与韩愈一样，也与一时古文家如刘禹锡、吕温、韩晔、吴武陵等人相往还，他虽谦称才能勇气不如韩愈，故不为人师，实际上还是努力奖掖后进，当时后学之士追随他学习的颇多，经他指点，为文都有法度。所以，他之成为古文运动的又一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他与韩愈虽在政治主张等诸方面不尽相同，但在为人、为学上彼此钦敬，各自对对方的古文成就有很高的评价。由于领袖人物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和明确的理论主张，有一批追随者积极响应，一场以儒学为旗帜，以复古为号召，以文体改革为中心，同时在深层意识中有维护唐王朝统治为目的的古文运动，遂演成相当巨大的声势，韩、柳两家散文也由此被人奉为古文的典范。

中晚唐时代，在韩愈影响下，出现了李翱、皇甫湜、孙樵等古文家。但他们的成就均不及韩柳，有的更是一味求奇，使文风陷入晦涩而缺乏号召力。晚唐五代以迄宋初，仍是骈文势力强大。在宋初文坛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西崑派，其诗文均崇尚骈偶，文辞华艳。宋代前期，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出来反对浮华文风，均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直到欧阳修出来，不但摒弃“西崑体”，反对六朝以迄唐代的崇尚骈俪声律之文体，还注意克服倡言古文者好为怪僻之语的“太学体”，取韩文为范式而兼采骈文，以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同时，他承韩柳重道之说，以为道胜文至，但又极重视散文创作自身的文章特点，不抹杀古

文的独立地位。由于他凭藉贡举的优势地位，作有倾向性的提倡，使浮艳文体一时失去市场，以怪僻知名者也黜落殆尽。他还以独到的眼光，敏锐地发现如苏轼父子这样的人才。经过欧阳修的提倡和主持风气，文风变而趋于复古，而这复古与韩愈一样，是以复古为革新。

当然，苏轼父子及王安石、曾巩等人的理论响应，特别是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是促成宋代散文革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欧阳修的指导下，在上述诸大家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下，新一轮的古文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经由宋代六家大力有效的提倡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欧阳修、苏轼突出的创作实践，一种新的古文观得以确立。一方面，它继续崇信韩愈所标举的儒家之道，同时注意赋予这种道以更广泛的现实内容，使之“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另一方面，更重视古文独立品格的实现，既要求它事信而载大，又要求它有自然流畅的审美品位。在这种古文观指导下，诸如欧阳修的条畅绵邈，苏轼的雄肆通脱，苏洵的驰骤博辩，还有曾巩的平正婉雅，王安石的简洁峭拔，苏辙的冲和澹泊，皆各逞其姿。他们以这种自然平实又深切著明的新文体来言事论政，谈兵议学，记叙山水，宣泄性情，既不完全排斥骈偶藻绘，但又不苛求属对精切缜密；既不排除详赡博达，但又截然无取繁富冗长，不明体要。并且，比之韩柳等唐代古文家，他们的散文指事析理，要求洞彻，写景抒情，每趋清畅。倘若说，唐人作文更重字句的锤炼和气势的营建，他们则更多地用平易流畅的语言，从容不迫的节奏和体调，造成一种清新朗练的风格。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虚实字的研究和运用，对创作技巧、手法的探索和总结，对古文本身体式的创设和拓展，都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文在他们手中，确实达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

唐宋八大家在散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上所述是巨大的。无论是从散文的理论建设来说,还是从实践积累来说,它都给后人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为后代散文创作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韩、柳古文理论和创作是欧阳修等人再兴古文运动的精神榜样自不必说,即此八家散文对后世历代文人的影响而言,也是十分深远的。元明清时代,虽有一些人无取乃至排斥唐宋古文,以秦汉文为至上的样板;还有一些人则更以复兴骈文为职志,排斥一切散体古文,称“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后》),但在明代自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到“公安派”、“竟陵派”作者,大抵都是沿韩柳及欧苏古文一派而取得实绩的。清中叶方苞、刘大槐、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及后起的梅曾亮、恽敬、曾国藩等人,也是从八大家古文中得到无穷的滋养,其沾溉来叶,垂范后昆,厥功甚伟。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编选了这一套唐宋八大家书系。所选篇什大抵录自各家别集,大多数为当日及后世有定评者。它们既体现了八家古文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又关涉唐宋两代整个散文创作的发展关键和主体。限于篇幅,尚有一些佳作未能悉数选入,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前言

马德富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自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辙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文化空气非常浓厚的家庭。其父苏洵当时“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其兄苏轼也“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在父兄的影响和熏陶之下,苏辙自幼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并关心时事,具有宏远的抱负。后来在《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一诗中,他回忆当时的情形:“念昔各年少,松筠阆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便是他早年读书生活的真实记录。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辙与兄轼同榜进士及第,一时“名动京师”。嘉祐六年(1061)兄弟俩又同举制科,苏辙在对策中极言朝政得失,考官司马光认为“其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忌,于(应试)四人中最为切直”,主张第以三等,但也有人“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仁宗最后考虑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遗老斋记》),故第以四等。此时苏辙才二十三岁,虽说制科考试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也算是少年得志了。不过这并未能保证他仕途的顺利。

苏辙最初是抱着济世安民的愿望步入仕途的，他说：“辙少而读书，中颇喜事。既挟策以干世，诚妄意于济时。”（《除中书舍人谢执政启》）对于当时日渐深重的内忧外患，他有清醒的认识，早在嘉祐六年举制科时的进策中他已指出：“盖当今之所为大患者，不过曰：四夷强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饬，重赋厚敛而用度不足，严法峻刑而奸轨不止。”（《君术策第一》）他对此深感忧虑，设想采取一些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但他的设想和王安石变法并不一致，加之他看到变法在用人和具体实施中的一些弊病，就使他对这场变法持批评的态度，并由此而卷入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他的命运也随之而升沉起落。熙宁二年（1069）他上书神宗，即日召对，被任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由于议事每与王安石不合，八月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提出批评，并请求去职，遂除为河南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任陈州（治今河南淮阳）教授，六年（1073）为齐州（治今山东济南）掌书记，九年（1076）改南京（治今河南商丘）签书判官。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诗文讪谤朝政的罪名被捕入狱，后被谪为黄州团练使，苏辙也坐贬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监盐酒税，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移官绩溪（今属安徽）令。这时距他进士及第已经二十七年，二十七年中他仅做了些职位卑微的小官，政治才能未得以施展。但随着朝政的变化，苏辙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渐次被废，朝政大变。同年八月苏辙被召还朝任校书郎，未至都门即擢为右司谏，翌年九月擢起居郎，十一月升为中书舍人。其后曾担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短短六七年间，他竟由县令升为副相，迁进之速，非同一般。但是

好景不长，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起用新党，朝政再次大变，苏辙的命运也随之逆转。绍圣元年（1094）三月落职知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六月降三官知袁州（治今江西宜春），九月贬居筠州。绍圣四年（1097）又贬居雷州（治今广东海康），五年被移居循州（治今广东龙川）。直到哲宗崩、徽宗立，他才遇赦北归，寓居许昌颍水之滨。政和二年（1112）病逝，年七十四。

苏辙在政治上总的说来是失败者，但他在文学上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其诗朴实清新，自成一格。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诗胜过乃兄，当然这一说法未免太过。苏辙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的文章最多的是政论和史论，然后是书信、记序、传状等，日常应用文也占了相当比例。他自己说：“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栾城先生遗言》）而苏轼却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又说：“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书子由超然台赋后》）苏轼对其弟的散文评价颇高，同时也准确道出了他文章的风格和艺术特点。苏辙为文主张养气，他秉承韩愈“气盛言宜”之说，并加以发展，“以为文者气之所形”，必须“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上枢密韩太尉书》）。他自己的创作就正是如此，“平正通达，不求为奇，而势如长江大河，是小苏之所长也。”（唐顺之语，《唐宋八大家文钞》引）具体来说，其文结构严谨，行文简洁畅达，语言朴实雅健，在短短篇幅中，往往一波三折，极尽委曲变化之能事；且说理透辟精警，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比如他的《民政策第二》，其主旨在于论述宋代科举之弊，但却首从周秦民风之异说起，后半部才自然

入题，指责朝廷一方面想“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一方面却仅仅以科举取士，以致“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文章主旨至此才完全显露。清人刘海峰云：“子由之文，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纡徐百折而后出之，于此篇可见。”又如《唐论》，前面用了一半以上篇幅论述一般历史现象，无只字及唐，但却处处为后面论唐作铺垫，而论唐又实际上是在论宋，是为宋王朝开救弊的药方，落笔甚远而紧扣中心，言在彼而意在此，具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论说文如此，记叙文亦然。如《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先置修殿不顾，放笔从远处说起，由早年父兄对画的喜好引入，继之盛赞范琼、赵公祐、孙遇三位画家的超妙，最后结出吴道子，如此层层迭进，以范、赵、孙为衬，虽不详写吴画，然吴画之精妙已在不言中。由此顺势而下，从对吴画的赞叹进入修殿的始末，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全文结构委婉曲折，颇具匠心。此外，苏辙不少杂记、传状也富于文学色彩，语言雅隽，不事雕绘，然而形象生动，常给人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如《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首段写栖贤寺周围的风景，虽着墨不多，但怪石之岌岌，溪水之汹涌，林木之葱茜，均宛然在目。苏轼对此文评价很高，说：“子由近作《栖贤堂记》，读之惨懔，觉崩崖飞瀑逼人寒栗。”（《与李公择书》）又说：“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葛。”（《跋子由栖贤堂记后》）清人王士禛也认为此文“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带经堂诗话》卷三）又如《武昌九曲亭记》，首段粗线条勾勒黄州附近山水，中间顺游踪点染西山之胜，近景远景，山水林木，“苍森历落之意，读之如在目前”。其中写苏轼的活动，“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

南”，“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撝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三言两语，略加点染，人物便栩栩如生，神情俱出。

在有宋一代散文作家中，苏辙洵为高手。其成就总的来说不如其兄，但也有自己的建树，自成一家，在某些方面亦不让轼。《宋史·苏辙传》说：“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其高处殆与兄轼相逼。”明代茅坤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铓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道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焚错，云霞之蔽亏，日星之闪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唐宋八大家文钞》）这些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

本书精选苏辙各个时期代表作共五十八篇，所依底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所出《栾城集》，个别地方使用了《四库全书·宋文鉴》等。选文尽量考虑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同时兼顾到题材和体裁等因素。选文按年代编排。每篇文章均有题解，交代写作时间和背景，并对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略加评析，以帮助读者的理解。注文以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读懂为基准，力求准确，一般从详。为省读者翻检之劳，对重复出现的词条，如果较短，都作了重注；有些较长的词条则采用前后参见的办法，以免过多重复。

相信读者读了此书，定会对苏辙散文的风格特征、艺术成就有具体的了解，有所收获，有所启发。不当之处，希批评指正。

1996年10月于锦江畔

目 录

总序	王运熙
前言	马德富
上枢密韩太尉书	1
六国论	5
三国论	8
唐论	12
君术策第五	19
臣事策第二	23
臣事策第三	28
臣事策第四	32
民政策第五	37
民政策第七	42
民政策第九	47
上昭文富丞相书	53
上曾参政书	58
上两制诸公书	62
御试制策(节选)	72
谢中制科启	86
上刘长安书	90

登真兴寺楼赋并叙	93
新论上	97
新论中	106
孟德传	112
祭欧阳少师文	115
洛阳李氏园池诗记	122
齐州泺源石桥记	126
超然台赋并叙	129
自齐州回论时事书	134
王氏清虚堂记	139
黄楼赋并叙	142
墨竹赋	150
为兄轼下狱上书	155
答黄庭坚书	159
东轩记	162
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	166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	169
吴氏浩然堂记	172
黄州师中庵记	175
武昌九曲亭记	177
答徐州教授李昭纪书	181
黄州快哉亭记	183
南康直节堂记	187
乞选用执政状	190
乞诛窜吕惠卿状	197
除中书舍人谢执政启	208

御风辞·····	213
元祐会计录叙·····	218
李简夫少卿诗集引·····	226
汝州杨文公诗石记·····	229
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	232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236
书白乐天集后·····	240
巢谷传·····	244
祭亡兄端明文·····	249
三宗·····	253
汉光武上·····	257
唐太宗·····	260
遗老斋记·····	266
藏书室记·····	269
诗病五事(选一)·····	274
附录	
苏辙传·····	278

上枢密韩太尉书

【题解】本文作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是苏辙考取进士后上枢密使韩琦的书。当时苏辙十九岁。韩太尉，即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时任检校太傅，充枢密使。后来又任宰相，英宗时封魏国公，名望很高。枢密使，执掌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职位相当于秦汉时太尉，故称之为韩太尉。

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倾诉对韩琦的仰慕，希望得到韩的重视和接见，但一开始并不直说，首先纵谈文与气的关系，接着陈述自己想博览天下奇闻壮观、结交一代英贤的愿望，最后才点出意旨。全文不落俗套，层层深入，一气呵成，“疏宕有奇气”（储欣《梁城先生全集录》卷一）。其中关于文与气的论述，强调内心修养和外界阅历对养气的重要性，很有见地。

太尉执事^①：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②，以为文者气之所形^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④。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⑤。”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⑥。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⑦，故其文疏荡^⑧，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